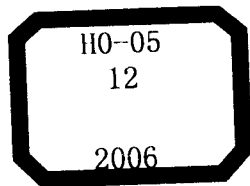


文化语言学研究

A Study on Cultural Linguistics

刘 静◎著

中华书局



文化语言学研究

刘 静 著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语言学研究/刘静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6

ISBN 7-101-05355-6

I. 文… II. 刘… III. 文化语言学-研究 IV. H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1117 号

书 名 文化语言学研究

著 者 刘 静

责任编辑 秦淑华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250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5355-6/H·281

定 价 24.00 元

横通纵贯之作

——序刘静《文化语言学研究》

鲁国尧

九月中旬，我所服务的学校，新的硕士生、博士生入学，照例召开一次较大规模的会议，新生与老生、老师见面。传统道德在中国还行用，在教师里，我的年龄最大，因此总要求我在会上讲些话，我既然在岗，就得接受，接受后，就一直在脑中酝酿讲些什么。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话不同。应该根据我的观察、我的思考，讲些“有价值”的话，须有针对性，有利于同学，我亦以自勉。

今年九月，我讲的什么呢？

我自研究生毕业，分配来校，已经41年有余，做了这么长时间的教师，总有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我感到，近年学生入学学习有个误区，教师，就只谈我本人，不涉及他人吧，也有个同样的误区。我以为，这个误区主要是由教师造成的，应由教师，就是我了，负责任。这个误区是什么？就是学生入学，是为了学专业知识。教师跟同学讲课的内容、平日交谈的内容，也绝大多数与专业学习有关，比如我们音韵学专业，师生交流的内容离不开音韵学。我认为，这就是当今学者“陋”的原因。朱德熙先生在《纪念王力先生九十诞辰文集序》中说：“回过来看50年代以来培养的学生，其中虽然也不乏杰出者，但总的来说，失之于陋。”^①依我看，近年培养的学生，确有不错的或很不错的，

^① 《纪念王力先生九十诞辰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

但是总体上更陋。陋的表现就是窄，知识面窄，治学面窄。我的老师林焱先生曾对我说过：“看一篇文章，就知道作者他读过多少书。”尤其是近年，文章或专著专则专矣，然而陋益甚矣。

第二个误区是，中国传统教育的目标是“进德修业”，而现在的大学里，重视“修业”，忽视或轻视“进德”。只要看看当今的学界，抄袭者有之，道德恶劣者有之。只要看看这转型期的社会，坏人更坏，有若干本不坏的人也变坏，就说明迫切需要荣辱观的教育。

我在会议上讲的这些话，也跟读刘静教授《文化语言学研究》书稿后所感有关。今年八月，她将书稿给我看，并让我作序。我以前读过她的《汉语音韵学纲要》一书，还有若干论文，她研究音韵学，当行出色，专家！及至读了她这部新稿，我不由说，要在千军万马的学术营地寻觅刘静教授的话，芸芸众“陋”里无法找到她的身影，她是立在“杰出者”“高明之士”的行列里。何以如是说？文化语言学可以说是文化学与语言学的交叉学科，或者说是交融学科。语言学的分支本就很多，如今越来越多，据我的粗浅了解，文化学是比语言学还要大的学科，“包罗万象”四字足以称之。这两大学科结合，用今天的流行语言说，是“强强联合”，其内容则大为丰富。

文化语言学方面的书我读过其中的一些，对其作者我总是佩服他们的学术视野之阔、学术功力之强。说通俗些，我惊讶，他们怎么懂得这么多？他们怎么钻得这么深？请看刘静教授的这本书，除了语言学外，还涉及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文献学、民俗学、人类学……。她要讨论这么多学科里的学问，多不容易！要有多么宽广的学术素养，要付出多么艰辛的劳动！写这么一部横通、贯通式著作的人，岂是陋人？

著《文化语言学》需要广度，自不待言。我以为，对所论到的非语言学科，难的是深度。刘静教授的这本书，可称道的是它

涉及其他非语言学科的学问时，都讲得比较深透，不是蜻蜓点水、浮光掠影。作者能达到这般境地，在于她对传统文化了解、研究都很深入，可见作者对自己国家、对自己民族怀有深厚的感情。

例如该书的“汉字文化”一章涉及近五百个古文字，搞清楚每一个古文字的形体结构及其意义并将这些古文字与商周文化联系在一起进行交叉研究，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据刘静教授自己说，她为了写好这一章阅读了大量的古文字学、先秦史、先秦文化等方面的书籍，诸如唐兰先生的《古文字学导论》、裘锡圭先生的《古文字学概要》、高明先生的《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吕思勉先生的《先秦史》《中国制度史》、柳诒徵先生的《中国文化史》、张光直先生的《中国青铜时代》等等。为写成一章四万字的书稿，她阅读的书籍和论文过百万字。

刘静教授对于文化和语言关系的深层次研究，除了源于书本知识以及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理解外，还来源于这些年来她在国外的经历。两年多的日本生活、三年多的美国生活使她得以直接体验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并找到了最好的学习两种外语的机会。而语言学家学习外语和一般人学习外语的显著区别就是前者不是单纯地模仿外语的语音、背诵单词和掌握语法规律，同时还注重外语中所包含的文化因素。在这本书里可以随处见到刘静教授精心选择的日语或者英语的例子，运用比较研究法探讨汉语文化和日语、英语文化之间相互区别和相互影响的关系。

我自己有这样的经验，文章发表后，在读书的过程中，又发现了新的材料，或者又有新的见解，因此就希望将自己的老文章订补。我以前读朋友的书，读了后，常对朋友说：“请您在几年后再出一个增补本。”语言学界最有名的例子是前辈蒋礼鸿先生，他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出了五次，一本比一本丰富，一本比一本精深。我对老友刘静教授，也是希望她今后继续推出《文化

《语言学研究》的增补本，不过，我更希望她出多卷本。一因文化语言学这一学科发展空间太大，英雄用武之地太广，刘静教授此书主要探讨了四个专题，凭她的识、才、学，必可作大规模、深层次的开拓；二因我很敬佩外国学者出书动辄多卷，而我国学坛基本上是单卷本的天下了，这也许是中外学术的差异吧。我希望刘静教授的《文化语言学研究》也出多卷，为中国学术添一奇葩。

再饶舌两句，讨论一下通用的称呼词问题。建国后，多少年来，通用的称呼词都是“同志”，特别在阶级斗争被强调的时候，曾经被打成“右派分子”或什么的人，一旦支部书记或总支书记在其名下殿以“同志”二字（或音），他会受宠若惊，感激涕零。现在的青年人对此一定感到陌生或不可理解，他们哪里知道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人！现在“同志”一词作为通用称呼词退线了。前一些时，见什么人都叫“师傅”，如今好像“老师”一词有成为通用称呼词的趋势，但是看来都没有能达到“同志”当年的水准。现在见人该打招呼表示礼貌时，真有点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不用“同志”用什么词？这是我的困惑，估计语言学专家已经研究过，并有合理合时的方案。我之所以絮语，是因为我觉得文化语言学可以鉴古，也可以知今，也应该“干预生活”，它既是研究型的学术，也是实用型的学术。看来需要有更多的学者参与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相信刘静教授今后的成果必更辉煌。

2006年国庆节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1.1 文化语言学的界定	1
1.2 语言的文化性质	2
1.3 语言的文化价值	7
1.4 文化语言学的兴起及其发展.....	16
第二章 汉字文化	20
2.1 商周社会的物质文化.....	21
2.1.1 生活方式.....	21
2.1.1.1 居住	21
2.1.1.2 城邦、交通	26
2.1.1.3 饮食	30
2.1.1.4 服饰	33
2.1.2 生产方式.....	37
2.1.2.1 采集和渔猎	38
2.1.2.2 畜牧	40
2.1.2.3 农耕	43
2.2 商周社会的精神文化.....	49
2.2.1 原始宗教.....	49
2.2.1.1 自然崇拜	49
2.2.1.2 生殖崇拜	53
2.2.1.3 祖先崇拜	58
2.2.2 刑法	64
2.2.3 婚姻	69
2.2.4 审美和艺术	76

第三章 外来语文化	82
3.1 语言借用和文化交流的关系	82
3.2 汉语外来词的主要形式以及对现代汉语所产生的影响	85
3.2.1 汉语外来词的主要形式	85
3.2.2 汉语外来词对现代汉语所产生的影响	89
3.3 汉、唐时期与西域文化的接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外来词	91
3.3.1 汉唐时期汉民族与西域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91
3.3.1.1 张骞出使西域	91
3.3.1.2 唐朝与西域的文化往来	95
3.3.2 汉唐时期从西域传入的外来词	96
3.4 明末清初与西方文化的接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外来词	98
3.4.1 明清时期的西学东渐浪潮	98
3.4.2 明清间从西洋传入的外来词	104
3.5 鸦片战争至洋务运动时期的翻译活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外来词	106
3.5.1 鸦片战争至洋务运动时期的翻译活动	106
3.5.2 鸦片战争至洋务运动时期产生的外来词	108
3.6 五四运动前后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外来词	109
3.7 佛教文化的传入及其对汉语所产生的影响	115
3.7.1 佛教的传入及其发展	115
3.7.2 佛教文化对汉语及汉语研究所产生的影响	119
3.7.2.1 词汇方面	120
3.7.2.2 语法方面	130
3.7.2.3 音韵方面	134

3.8 中国文化传入日本及其对日语和日本文字所产生的影响	137
3.8.1 隋唐以前中日文化交流简况	137
3.8.1.1 徐福东渡日本	137
3.8.1.2 “汉委奴国王”印和“亲魏倭王”印	140
3.8.1.3 遣隋使和遣唐使	146
3.8.2 中国文化对日语和日本文字所产生的影响	152
第四章 姓氏文化	163
4.1 研究姓氏文化的意义	163
4.2 姓氏文化的特征	164
4.3 姓氏的起源和发展	169
4.3.1 姓的起源及其作用	169
4.3.2 氏的起源及其作用	179
4.3.3 战国之后的姓氏合一制	186
4.3.4 姓氏合一制的发展	188
4.4 名字的起源及其作用	193
4.4.1 名字的起源	193
4.4.2 名和字的命名方式	194
4.4.3 名和字用法上的区别及语义上的互补关系	197
4.4.4 避讳制度	200
4.5 形形色色的号	203
4.5.1 自号	203
4.5.2 谥号	207
4.5.3 庙号、尊号、年号	211
4.5.4 法号、道号	215
4.5.5 绰号	216
第五章 称谓语文化	219
5.1 研究称谓语文化的意义	219

5.1.1	称谓语的界定和生成方式	219
5.1.2	研究称谓语文化的意义	224
5.2	汉语亲属称谓语研究	228
5.2.1	汉语亲属称谓语系统	228
5.2.2	汉语亲属称谓语和古代宗法制度的关系	232
5.2.2.1	古代宗法制度	232
5.2.2.2	汉语亲属称谓语和古代宗法制度的关系	235
5.2.3	汉语和英语亲属称谓语系统的比较研究	238
5.2.4	汉语亲属称谓语的泛化——拟亲属称谓语	244
5.3	汉语社会称谓语研究	246
5.3.1	汉语社会称谓语系统	246
5.3.1.1	职业称谓语	247
5.3.1.2	通用称谓语	250
5.3.1.3	姓名称谓语	254
5.3.2	古代汉语和现代日语中的敬称和谦称	256
5.3.2.1	古代汉语中的敬称和谦称	256
5.3.2.2	日语中的敬称和谦称	259
5.3.3	现代汉语称谓语的缺环现象	262
5.3.4	新时期称谓语的产生及其世俗化色彩	266
	后记	274

第一章 绪 论

1.1 文化语言学的界定

文化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文化性质和文化价值的一门综合性的语言学科。语言的文化性质是指语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语言属于文化的范畴。语言的文化价值是指语言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通过研究语言可以认识和了解文化的各个方面，诸如社会制度、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历史地理、文学艺术等。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就是要把语言放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挖掘语言中蕴藏的文化宝藏，探讨语言和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文化语言学属于解释性的语言学科，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与描写性的语言学科有着明显的区别，两者为平行互补关系。描写性的语言学科着重于语言本体的研究，诸如语音面貌、词汇分类、句法结构的研究等；解释性的语言学科则侧重于语言和其他学科之间关系的研究，诸如语言和文化、语言和社会、语言和哲学、语言和生态、语言和认知等关系的研究。文化语言学虽然才有几十年的历史，但是，它的产生对于积极推动汉语研究向前发展，弥补汉语研究之不足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五四运动之后，汉语研究在西学东渐浪潮的冲击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原有的文字、音韵、训诂即所谓小学研究积极借鉴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从语文学中解放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具有高度科学性的语言学科。

在将近一个世纪的研究中，汉语研究的各个领域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音韵学和语法学领域的成绩最为突出，初步建立了汉语语音发展史和汉语语法体系。

然而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汉语研究的不足与偏颇。一方面，在借鉴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时，有明显的生搬硬套的迹象，这一点在汉语语法研究上表现得尤其突出。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是建立在印欧语系基础之上、为描写和解释印欧语系而建立的一套理论和方法。因此它不可能完全适合汉语的实际，汉语属于汉藏语系，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与印欧语系有着很大的差别。另一方面，在将近一个世纪的研究中，几乎全部的精力都集中在汉语的平面描写上，忽略了对汉语进行解释性的研究；偏重于汉语本体形态的研究，而很少进行汉语和其他学科诸如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学科的交叉性研究。应该说这样的研究是不全面的，是有缺陷的，因此必须加以纠正。人类语言的性质是多方面的，应该对其进行多角度的、全方位的研究，这样才有可能全面认识和把握语言的性质及其变化规律。

文化语言学正是从纠正以往汉语研究的偏颇入手，扩大汉语研究的领域，着重研究汉语的文化性质和文化价值，研究语言 and 文化的相互影响及其互动关系。文化语言学是汉语研究领域的一个新学科，它的产生和发展必将为汉语研究增添新的活力，并将推动汉语研究朝着更加深入更加全面的方向发展。

1.2 语言的文化性质

关于文化的定义有很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现代汉语词典》对“文化”一词的解释包括有三项含义：（1）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教育、科学、文艺等；（2）考古学用

语，指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依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同样的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3)指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根据这个定义的第一项含义，可以得出语言属于文化的范畴的结论，因为语言也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财富。众所周知，人类进化之初是没有语言的。原始语言产生之前，人类的祖先曾经用手势交换意见，这种手势语言大概持续了100万年到150万年的时间，然后才被有声语言所代替。从本质上讲，没有语言的人类和动物没有根本性的区别。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对动物世界的研究逐步深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直立行走、会使用工具、交流信息，这些特征均不足以构成人和动物之间的根本性区别，惟有语言才是人类和动物的最主要的区别点。我们说语言具有文化的性质，是因为语言是人类在劳动过程中逐步创造出来的，是人类创造出的最伟大的成果之一。美国著名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对于语言的产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语言是人类精神所创造的最有意义、最伟大的事业——一个完成的形式，能表达一切可以交流的经验。这个形式可以受到个人的无穷的改变，而不丧失它的清晰的轮廓；并且，它也像一切艺术一样，不断地使自身改造。语言是我们所知的最硕大、最广博的艺术，是世代代无意识创造出来的、无名氏的作品，像山岳一样伟大。”^①

《现代汉语词典》中有关文化的定义有不完善的地方，其后两项完全可以合并在第一项当中。所谓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可以理解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财富。运用文字的能力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获得和掌握的，当然应该属

^① 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第151页，胡明扬主编《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版。

于文化的范畴。但是就能力而言，不仅运用文字的能力属于文化的范畴，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获得的任何一种能力都属于文化的范畴，诸如认知能力、社交能力、写作能力、讲演能力等，当然也应该包括语言能力。语言既是人类在劳动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财富，同样也是人类在劳动过程所获得的一种能力。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Burnett Taylor）在《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所下的定义相对比较完善。泰勒说：“所谓文化或文明，在广义民族志的意义上，是一个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性的复合体。”^① 根据泰勒的定义我们可以把文化划分为三个范畴：（1）观念范畴：包括信仰、价值、习惯势力等；（2）行为范畴：包括语言、体态、风俗、饮食等；（3）产品范畴：包括文学、美术、音乐、工艺等。应该强调的是，在文化的各个领域当中，语言是人类最古老的文化产品，文化的任何其他产品都不可能早于语言，没有语言就没有其他文化。

文化通常是指特定社会中存在的独特生活形态，即在思想、认知、情感、信仰、行为上与其他社会有着明显的区别。人类学家一致认为文化有三个特征：习得性、内在一致性（强调文化的认知、价值、信仰和习惯的相互联系和整体性）和自觉性或者说无意识性（即文化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习得，不与其他文化比较是很难感觉到）。文化的习得性是其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文化作为人类的创作活动和知识积累，其全部成果均是后天得来的，所获得的所有能力也都是后天形成的。语言同样具有习得性，语言不是人的本能，语言是在人的认识活动中逐渐形成和完善的，是必须经过学习才能掌握的。爱德华·萨丕尔分析了语言和走路这两种人类活动：“一个正常的人先天就注定要走路，并不是因

^① 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第1页，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

为大人帮助他学会走路这种技术，而是因为从出生起，甚至于从受胎起，他的机体就准备好承担起走路这件事的一切神经机能消耗和一切肌肉适应。概括地说，走路是人类的遗传的生物的功能。语言不是这样的。自然，在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先天注定要说话，也是对的。但这完全是由于他不只是出生在自然界里，同时也出生在社会怀抱之中，而社会一定会，大概一定会领导他走向传统。没有了社会，如果他还能活下去的话，无疑他还会学走路。但是也同样可以肯定，他永远不会说话，就是说，不会按照某一社会的传统体系来传达意思。”^① 概括来说，萨丕尔的主要观点就是，语言和走路的性质不同，走路是人遗传的、生理的、本能的功能，说话则是非本能的、习得的、文化的功能。从这个角度来看，语言具有文化最基本的特征。

人类之所以创造语言，是为了满足自身表达和相互交流的需要。语言在发展的最初阶段，需要确定每一个不同的发音与某个词之间的对应关系，同时赋予这个词内在的涵义。这一点可以从孩子学习语言的实践中获得佐证。父母或老师往往指着对象，将孩子的注意力与具体形象相对应，同时说出一个词。这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谓的“指物定义”^②。根据这种学习方式，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是语言的首要任务是确认物与词之间意义的关联；二是语言是习得的，是通过后天学习获得的能力。

语言是一个凝聚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和感受的符号系统。语言既是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反映文化其他部分的一面镜子。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语言和其他文化现象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作为文化的镜子，语言映照出民族文化乃至整个

^① 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第142页，胡明扬主编《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版。

^②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6~8页，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人类文化的种种特征。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Leslie A. White),对于语言构建文化的功能做了详尽的描述:“全部文化或文明都依赖于符号。正是使用符号的能力使文化得以产生,也正是对符号的运用使文化延续成为可能。没有符号就不可能有文化,人也只能是一种动物,而不是人类。音节清晰的语言是表达最重要的形式。把语言从文化中抽掉,还会剩下什么东西呢?……没有语言,我们就不会有政治、经济、宗教和军事的组织,没有礼仪和道德规范,没有法律,没有科学、神学和文学,除了猿猴水平的嬉戏外,不会有游戏和音乐。没有音节清晰的语言,礼仪和礼仪用品就毫无疑问。实际上,没有音节清晰的语言,这就差不多等于丧失了使用工具的能力,我们将像在高等类人猿中发现的情况那样,只是偶然地和无意义地动用一下工具。因为,正是音节清晰的语言,才使类人猿那种偶然动用工具的活动,转变为人类之具有进步性和累加性的使用工具的活动。”^①语言作为符号系统,属于人类特有的第二信号系统。

人类文明进步越来越快,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我们在生活中获得的知识,可以借助语言符号系统传给后代。积累越来越多,愈是后人,便愈多地承受先辈的知识。这种承接是靠语言来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过去的教科书一直是这样给语言定位的。现在看来,我们还应该进一步加深对语言性质的认识,因为如果将语言的性质仅仅定位在文化载体的层面上是浮浅的,是不全面的。也就是说,这种定位只看到了语言的表象,而没有抓住语言的实质。语言单纯是文化的载体的话,那么,语言就可以脱离文化而独立存在。或者反过来说,文化可以甩开语言而另外选择其他物质做载体。实际上,这两种假设都是不能成立的。每一种语言都凝聚着该民族文化发展的成果,而一

^① 怀特《文化的科学》第33、34页,沈原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